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其同改革的关系

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益崛起,毛泽东时代遗产及其同改革之关系渐成美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时代留下了包括"现代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奠定"、"社会民生得到一定改善"、"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形成富有价值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既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遗产。毛主义遗产对此后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亦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解读启示着我们,虽然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也正是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必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进一步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 美国学者; 毛泽东时代; 历史遗产; 影响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5)01 - 0047 - 07

American Scholars' View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MAO Zedong Era and China's Reform

WU Yuanyu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ising of China after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of MAO Zedong era and the refor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academic field paid attention to by America scholars. In the view of American scholars,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MAO Zedong era is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including "establishing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base", "improving social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forming the powerful national mobiliz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forming valuable idea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MAO Zedong era has insepar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reform, which can not be ignored. America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MAO Zedong era tells u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tudy perspective, awareness of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and basic conclusion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However, by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its in - depth analysis and critique, we can draw beneficial nutrition and our awareness of academic self -

收稿日期: 2014 - 08 - 10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阳光计划"项目"美国学者视阈下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研究"
作者简介: 吴原元(1977 -),男,江西东乡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与美国中国学史。

examination is stimulated, which will further promo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MAO Zedong era.

Key words: American scholars; MAO Zedong era; history legacy; effect

以研究毛泽东而闻名于世界的美国学者施拉姆(Stuant R. Schram)曾说过:"二十世纪的重要人物几乎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受到极不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评价。"[1](P3)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其影响的评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众所周知,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段被国外学者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时期,中国为了实现宏伟的目标而进行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和奋斗,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形成了许多至今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在重大的选择与努力方面亦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致使中国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苏珊·奥格登(Suzanne Ogden)所说,"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决不是一部失败史,而是既有某些非凡的成功,又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鉴于中共在1949年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他们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是令人吃惊的"。[2]国外学术界对于毛泽东时代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究竟该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对于毛泽东逝世后的改革又有着怎样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俄国学者巴赫金认为,"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种文化只有在他者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3]或许,借助"他者"的视角会让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有更为清醒而全面的认识。基于此,本文拟以美国学者视阈中的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为研究对象,梳理、分析美国学者如何评说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其对其后中国改革的影响。限于学识,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指正。

一、美国学者视阈中的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

美国关于毛泽东时代遗产的研究始于毛泽东逝世以后。1976年毛泽东去世,美国学者、政要纷纷发表评论,缅怀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由此开启了美国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热烈讨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尤其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了评价之后,美国对毛泽东历史遗产反思研究亦拉开帷幕。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学者对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讨论渐趋深入,其研究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① 综观美国学者的探讨,他们从多方面、多视角分析并反思了毛泽东时代所留下的历史遗产。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时代遗留下一笔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遗产。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代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奠定。尽管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脆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遭遇了许多失误和挫折,但毛泽东时代在工业体系的建设方面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引人瞩目的丰厚遗产。马克·布莱彻(Mark Bletcher)指出,在奉行毛主义的几十年里,"中国还大力推进工业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1952年占43%,1978年增至72%"。[4]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亦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中国的社会改造已经进行了3/4个世纪,有半个世纪社会陷于停滞状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则呈现出相当大的活力。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00–1949年很少变化,建国后30年则翻了三番或四番。钢产量在30年代不足100万吨,1949年增至200万吨左右,1979年上升到3200万吨。铁路里程,1900年大约0.2万公里,1949年为2.1万公里,1979年增至5万公里"。因此,"建国后30年内,中共领导人虽然发生过多次失误,但毕竟指引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中期阶段"。[5]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同样认为,"毛泽东的经济记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6]他在著述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

① 有关美国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研究的具体历程和概况,可参考成龙的《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30年研究述要》,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 1/4 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7](p540)

其二，社会民生得到一定改善。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教育得到了普遍发展，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得到了贯彻实施，并建立了比较普及的医疗卫生。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即如是言道，“除了大跃进时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经济下降外，中国的经济不仅实现了快速工业化，还成功地养活了十亿人口。广大人民的寿命、营养和卫生服务均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印度和其他农业大国相比，中国的经济(唯一的大跃进灾难性的饥馑除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8] 马克·布莱彻亦如是评价道，社会主义的头几十年奉行毛主义的政策，许多成就是在那个阶段取得的，“根据官方指数，1952 年－1978 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77%；同一时期人均粮食产量增长 11%，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数字……人口预期寿命达 68 岁，而 50 年代初远远不足 60 岁”。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衣、食、住方面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平，享有个人和民族的尊严”。[4] 彼得·利希腾斯坦(Peter Lichtenstein)则用具体数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至毛泽东去世的 1976 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使其众多的人口从赤贫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做了非凡的工作。从 1949 年至 1976 年，农业生产增长了 3 倍多。……其他的指数表明，在 1949 年至 1976 年间，人民一般生活水准得到了稳定的改进。人均国民收入从 1949 年至 1976 年获得了高速的增长。1948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仅为 36 岁，至 1975 年到 1978 年时，人均寿命已上升至 68.2 岁。死亡率从 1950 年的 18‰下降到 1976 年的 7.3‰。婴儿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250－300‰下降到 1973 年至 1974 年的 53－63‰。传染疾病发生率从 1954 年至 1959 年的 14.2－10.6‰降低到 1974 年至 1978 年的 1.6－2.0‰。不管你举出哪一项统计数字，中国人在 1976 年时的状况都要比 1949 年时好得多，这是确定无疑的”。[9] C. 里斯金(C. Riskin)同样认为，“在这一时期的若干时候，靠毛泽东的政策所唤起的人的首创精神，办起了合作医疗并取得了其他成就。保健和教育事业也推广到了农村”。[10]

其三，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20 世纪上半叶，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试图使国营经济部门在建立基础设施和引导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新的作用，却受到政治上四分五裂和软弱无力状态的限制。但在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且这个政府享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方针政策的权威，这同其以前半个世纪内战和对外战争连绵不断、18 世纪末以来长时期内中央政府大权旁落的局面相比，无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据此，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无疑，20 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 1949 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11](P314) 由于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能够有效而充分地动员社会资源，激发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取得不凡的现代化成就。正如罗兹曼所言，“一个单一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是 1949 年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增加凝聚力的一个主要因素”。[12](P599) 正是因为建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在一个最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同过去彻底决裂”。[5]

其四，形成富有价值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经近 30 年的探索和实践，毋庸置疑会形成富有价值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就理念而言，不少美国学者认为实现社会公正与平等是毛泽东时代所着力追求之一。彼得·利希腾斯坦如是指出，“毛泽东倡导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建筑在平均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之上的……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战略不同，毛泽东的方式是寻求使每一个人都平等地跨入发展进程，而不使任何人被遗漏。所有的人都应分享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3] 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时代还特别强调自主发展的理念。马克·布莱彻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强调自力更生著称。中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力求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中国是一个自成中心而独立发展的范例”。[4] 马克·塞尔登亦认为，“建立了不受外国资本和外国(政府)控制的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一；[8] 彼得·利希腾斯坦则认为，毛

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原因在于"这些成就无疑是试图将中国重新建设成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9] 正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致力于用这些理念指导发展,所以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引起西方热议的"北京共识"所包含的"创新"、"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自主理论"这些特征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13] 就思维方式而言,美国不少学者认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思维方式,不断地进行政策试验即是其中之一。阿里夫·德里克曾如是指出,"革命遗产的第二个意义虽然与第一个意义(指革命作为价值观念、志向和政策)相关,但却更为复杂,而且必定具抽象的性质。这个意义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中国革命过程——尤其是作为长期游击战争的共产党革命——的产物。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不断进行的政策试验:从 20 世纪 30 年代灵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到'漫长的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民主主义'再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再到 8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公开承认试验政策,提出了'进两步,退一步'等口号。他是一位'伟大的试验家'。……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试验的历史"。[14]

二、美国学者对"历史遗产"与改革之关系的解读

在不少美国学者看来,改革后中国取得的成就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是分不开的。莫里斯·迈斯纳即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正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份"遗产"为改革后的中国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7](P537)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亦认为,"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革命早前所取得的成就。1978 年到 1984 年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与改革有关系,但这仅是因为它们是建筑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之上的"。[15](P373) 对毛泽东时代评价不高的马丁·哈特-兰兹伯格(MartinHart Landsberg)也认为,"归功于 1978 年以后经济改革的成就被过分夸大,中国改革的早期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经济基础"。[16] 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看来,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是建立在早期政权所取得的成就之基础上,"虽然几次不妥当的热情和冒进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受教育状况和卫生保健到预期寿命等,都有了持续的改善。革命所寻求的社会转型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却带来了把国家团结和统一起来的组织转型,为 1978 年之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17] 他还进一步指出,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不应该抛弃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今天,有些人常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质疑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政策。我认为,这些举措不仅奠定了中国自主走向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而且也是确保在参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进而有可能走向崩溃的过程中,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社会福利的基础。"[13]

对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之于此后改革的作用及影响,美国学者还基于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详实而深入的解读。例如,斯蒂文·M·戈尔德斯坦(Steven M. Goldstein)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探讨了"毛主义遗产"之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改革之成功来自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他通过对比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指出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政治制度虽同属列宁主义体系,但毛泽东时代形成了"分散的集权国家",苏联则是典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中央官僚体制,正是由于两者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同,才导致中苏两国的改革结果不同。[18] 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同样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地方分权是改革成功之基础,"毛主义的遗产越来越被人视为毛以后取得成功的基础。毛主义比前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这一分权趋势在 60 年代与 70 年代也推广到农村工业化计划方面。中国开始改革时工业基地在地理上比较分散,所有权和控制权比较平均地分散在各级政府中,这使得地方官员有经验,也有能力对以后具有企业精神的改革政策作出反应"。[19] 佩内洛普·B·普赖姆(Penelope B. Prime)从毛

泽东时代资本积累方法与中国改革的意义方面分析指出，“虽然人们对毛主义在中国积累方法(以高积累率、自力更生、牺牲消费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消费模式)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邓政权现在是建立在(毛政权所取得的)成就之上却也是应该承认的。如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国际政策是不借债，资金不外逃。有了这二条，国内又有相当的工业基础，邓可以容易地重返国际市场而不用害怕会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此外，中国目前所以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发展得以成功，其基础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工业政策。用其他办法也可以取得目前的成果，但是不应该忽视现在的成果是毛主义的发展策略的结果”。[20]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亦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对中国的改革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莫里斯·迈斯纳即指出，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主义的某些方法和习惯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情况了”。[7](P581) 例如，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强有力的被称之为“国家动员发展”的体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时代更注重“人力资源”的动员，其突出表现是群众动员。中国在 1949 – 1976 年的近 30 年间，群众动员的范围之大、程度之深是空前的。高强度的群众动员，对于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有美国学者将群众动员视为“毛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两个特征之一”，认为“群众动员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21] 不可否认，群众运动式的国家动员发展体制的确能够在短时期内带来较快经济增长，但这种群众动员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动员方式，而且对个人选择和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加以严格地限制，从而压抑了社会和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有美国学者就以群众动员为特色的国家动员发展体制直言道，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动员发展体制确实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和原因，同时这一体制亦有效解决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诸如城市人口数量相对偏多等难题，但这一体制存在着非民主和非制度化动员等问题。[22](P289) 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23](P175)

当我们从纵深的历史视野来看待毛主义遗产与中国改革之间的关系时，会看到今日改革的诸多要素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毛泽东时代在对外对内两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对于此后的中国改革而言是复杂而矛盾的。正如斯蒂文·M·戈尔德斯坦所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来自‘底层’，党中央与中央政府的作用只限于‘促进改革’，而动力则来自‘地方’。这种看法是‘传统主义’的一种，其基本观点是：传统不仅是另一种变量，它还组成政治形势，将它的印记打在政治后果上。在某一点所作出的决定会限制未来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决定所形成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产生观念与利益，而机构与策略都要与之适应。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分析毛泽东以后改革的隐喻——‘摸着石头过河’。大多数人是把这一表述解释为强调渐进方式的重要性。然而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如果摸着石头过河，你就会被你所发现的方式紧紧束缚，你不可能把石头投到正好是你想投的地方，你必须按照石头的原来的位置走。构成改革政治基础的制度本身即是过去改革的结果。没有哪场体制改革是在河岸上起程的，都已是在河中的某个地方了”。[18] 在戈尔德斯坦看来，“毛的改革创立了一种制度模式——也就是‘石头’，它必将决定性地形成在毛逝世后所发动的改革的路线”；然而，与之同时他认为“在没有适当解决‘中国出现的市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前提下”，毛主义的遗产将决定“中国改革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18] 换而言之，毛主义特色的遗产对改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其亦对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形成限制甚至是束缚。总而言之，若是没有改革之前的历史，改革本身就难以展开。离开 20 世纪的历史道路去理解今天的困难和成就，恐怕是很困难的。

三、结语

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及其对改革影响的论述，固然一方面让我们对毛泽东时代一些具体的做法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比如，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权下放这一政策和地方政府被要求负责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任务,这就为开发地方资源和唤起地方积极性提供了渠道,也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不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被牢牢束缚,使他们在发展方面多少有一点自主性。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第二轮放权改革,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和社队不仅有了发展工业和非农产业的积极性和权力,也有了资金和市场,特别是企业和物资管理权下放以后的原料"就地解决"和消费品的严重"短缺",给市场调节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工业在该历史环境下得到较大发展,并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市场因素的逐渐增多。'文革"时期的这种发展状况,既使国民经济在政治动乱中仍然能够缓慢增长,也培养了毛泽东时代后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推动力量。① 另外,他们的解读亦使我们更为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不应被人为割裂。从 1949 年至 1976 年近 30 年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了不少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应看到,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还依然在享用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所言,'在试图不仅要估量毛晚年的政策而且也要估量他整个一生的时候,他对中国民族复兴所做的深远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大跃进期间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提倡的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对中国的国际威望有多大好处,当然还有待于讨论。然而,中国有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毛领导的和以他为象征的新中国已成为国际事务中须加考虑的一个因素,这在近代都是从未有过的"。[1](P456-457) 我们无法想像,在缺少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的情形之下,今天的中国还是否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还是否能够如此之快地实现令世人瞩目的崛起?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的解读存在不少误解甚或偏见。例如,有美国学者认为毛主义的发展观"所追求的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使中国连同其一切价值观念和组织、体制进入社会主义',"因此,现代化仅仅是想像中的达到共产主义之后的副效应。中共执政后前 30 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转化为政策,以迈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不是如何朝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他们看来,毛主义战略所珍视的"主要是平均分配,自力更生,扩大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单位的规模和消灭阶级剥削"。[2] 又如,莫里斯·迈斯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之间关系的担忧有着相当的思想深度,这警示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关系。但正如李佑新、陈龙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时,只是从浅显的字句而不是从精神实质与内涵来对比分析,就显得有些过于教条主义了,这种近似教条主义的观点再加上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与限制,他所得出的诸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政治民主没有什么进步、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将会在反对现存政体中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等一些观点与结论就显得十分偏颇和不当了"。[3,4]

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解读启示着我们,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如何理解中国发展道路正成为西方学界所热议的话题。也正因为如此,对西方人来说,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解读及其同改革的关系成为颇具吸引力的学术领域。当然,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及其同改革关系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忽视西方所涌现出来的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研究成果,因为西方学者基于其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不只是一个可供比较的重要的参照对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这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进一

① 有关毛泽东时代经济管理权下放,可参见:美国学者 C. 里斯金的《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5 期),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4 期),斯蒂文·M·戈尔德斯坦的《中国的改革应归功于毛主义的遗产》(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4 期)等。

步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认识。简言之，对待域外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及其同改革关系的研究成果，我们既应重视，但更应保持清醒头脑，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学术关怀和学术立场。

参考文献：

[1]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C].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2] 〔美〕苏珊·奥格登. 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1).

[3] 刘　宁. 巴赫金论文两篇 [J]. 世界文学，1999，(5).

[4] 〔美〕马克·布莱彻. 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3).

[5]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华人民共和国头 30 年的现代化进程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3).

[6] 晓　良. 美国学者看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建设 [J]. 科学社会主义，1999，(2).

[7] 〔美〕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M]. 杜　蒲，李玉玲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8] 〔美〕马克·塞尔登. 毛泽东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3).

[9] 〔美〕彼得·利希腾斯坦.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改革的迫切性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3).

[10] 〔美〕C. 里斯金. 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 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5).

[11] 〔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北京: 三联书店，1989.

[12]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13] 〔美〕阿里夫·德里克. 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

[14] 〔美〕阿里夫·德里克. 重议后社会主义: 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

[15] 〔美〕乔万尼·阿里吉. 亚当·斯密在北京: 21 世纪的谱系 [M]. 路爱国，黄　平，许安结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6] Martin Hart – Lands – berg. *The Chinese Reform Experience: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November28，2008.

[17] 〔美〕阿里夫·德里克. “中国模式”理念: 一个批判性分析 [J]. 国外理论动态，2011，(7).

[18] 〔美〕斯蒂文·M·戈尔德斯坦. 中国的改革应归功于毛主义的遗产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4).

[19] 〔美〕安德鲁·沃尔德. 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3).

[20] 〔美〕佩内洛普·B·普赖姆.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4).

[21] 〔美〕马克·布莱彻.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J].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4).

[22] Kenneth Lieberthal，Joyce Kallgren，Roderick MacFarquhar，Frederick Wakeman，Jr. (ed.).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C]. M. E. Sharpe Inc. 1991.

[23] 〔法〕弗朗索瓦·佩鲁. 新发展观 [M]. 张　宁，丰子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24] 李佑新，陈　龙. 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迈斯纳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 [J]. 国外理论动态，2009，(11).

(责任编辑: 郭荣华)